

我们走在 大路上^上

商国华 著

沈阳出版社

我们走在大路上 (上)

WOMENZOUZAIDALUSHANG

商国华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走在大路上：全2册 / 商国华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441-5207-5

I. ①我… II. ①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4146号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网 址：<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沈阳市池陆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60mm × 230mm

印 张：45.75

字 数：600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崔晓辉 王 莉 王 颖 赵秀霞

封面设计：杜 江

版式设计：姿 兰

责任校对：张希茹

责任监印：杨 旭

书 号：ISBN 978-7-5441-5207-5

定 价：90.00元 (全2册)

联系电话：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中国大工业的死与生

——商国华《我们走在大路上》之感动

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商国华都生活和工作在沈阳的铁西区（即小说中的“沈西区”）。这个著名的城区有一条著名的街道，“路两侧的工厂就像摆在案板上的饺子一样，一个挨一个，而且都是国字号的大工厂”。曾几何时，人们把这条街叫做共和国工业的装备部，而在世纪之交的1998年到2008年，这条街又被戏谑地称之为下岗一条街或工人度假村。诗人林雪说，这条街让她想起了本雅明的《单向街》。但是，单向街毕竟也有光荣而丰富的历史，也有艰辛而辉煌的转向，这就是商国华《我们走在大路上》所展示的历程。正如本雅明所写：“我以她的名字将这条街命名为/阿西娅·拉西斯街/作为工程师/她让这条街穿过作者。”

这条穿过作者同时也穿过读者的著名街道，在世纪之交的十年间，可以说见证了沈阳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国企改革的艰难岁月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时期。商国华是铁西工人阶级的儿子，他曾经参军，复员后就一直工作在这片工厂林立的热土上，直到走上领导岗位，也没有离开那里。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创作从最初开始，就投注到工业题材，倾情于工业书写。特别是近年来，他的一系列以国有企业改革振兴为背景的诗歌、报告文学、话剧和影视作品，在全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和关注。而《我们走在大路上》则是他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讴歌老工业基地的创业史，彰显当代中国

工业精神的艺术尝试。其文气之浩荡，诗意之挥洒，让人在感动之余，产生广阔的联想。

感动之一：工业精神。

几年前，我曾与商国华到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假。十多天的时间，面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商国华却能做到闭门不出，一直在那座小楼里写他的工业题材长诗《引擎》。现在读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让我联想到当时的情景。是一种什么力量或情感，会让他能如此矢志不渝、倾注心志呢？在这部长篇中我找到了答案，这种力量或情感的“引擎”，就是岁月和工业文明所诞生的工业精神，它既是昨天“凝重端庄”的宏大叙事，也是如今不屈的理想和英雄主义的浪漫。小说以王光汉临危受命，出任北阳重矿厂董事长为叙事起点，写出了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起死回生的改革历程。当时的工厂状况，恰如几年前的一部纪录片《铁西区》所拍摄到的，车间空空荡荡，机器默默无言，工人们随时在等待下岗。因为男人不开支，需要靠家里的女人养活，工人的宿舍楼被称作“养汉楼”。可女人靠什么养活男人呢？这些已经下岗的女工，无非是到路边擦鞋，或到舞场卖笑而已。“一台台淬火炉微弱的火苗，一个个家庭主妇埋怨的眼神，一个个催款路上疲惫的身影”，这就是北阳重矿所面临的处境，可能也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处境。读完这部长篇，就仿佛是当年东北文学的精神风貌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代的变革故事，人物的精神历史，北方的人生景观，以及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既是老工业基地的“一幅风情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也表现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歌哭呐喊，生的奋斗与死的坚强”。

比较而言，小说前半部的现实感更强，矛盾冲突更集中，后半部理想化的元素增多，但思路也趋于开阔。商国华以诗人的激情，报告文学家的勇气，直面体制弊端，展示生命悲欢，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不同寻常的复兴历程，寻找当代中国工业的薪火传承，也寻找工业深处的精神家园。

有人总结工业文学的类型，认为主要有“歌颂型、阵痛型、奋争型”三种，而在商国华的这部长篇中，我觉得这三种类型已经被作者的主体意识，也就是一种饱含热血激情的工业精神所熔铸，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结构的整合。这种工业精神，主要体现为工人阶级的宽广心胸和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奋发自强、相濡以沫的精神气质。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北阳重矿的决策者和普通工人，都自始至终保持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乐观情绪和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那分朴素的自豪感和责任意识：“咱现在很难，从来没有过的难，可是咱再难，还是国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长子是什么？“……长子不光是老大，长子还是责任，还应该是孝子！”尽管曾经走过的“大路”已突然变得狭窄、泥泞、艰辛无比，甚至出现了断桥，需要另辟新路，但这种由国企担当、长子情怀所构筑起来的工业精神却屹立不倒，并成为重新崛起的力量。从北阳重矿到北阳重机，王光汉、汪俭、冠新阳和工人群众、科技人员一起，靠“自己扶着自己走”，终于走出了那一条工业振兴的新路。空旷如街、只听风吟的车间又重新有了欢歌笑语，“一台天车从头上隆隆划过，天车上载满了醉人的阳光”。

感动之二：工人阶级。

商国华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无论工作、写作还是与人交流，他都给人一种不知疲倦的印象。尤其是当他谈起铁西区、谈起那些下岗职工的时候，他的雄辩和深情会带给你双重的感染力。此刻读他的这部长篇，我仍然会觉察出那种雄辩和深情的力量。很明显这不仅在于叙述本身，而是出自真实和真诚的力量。小说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情节，可能就是实际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比如大海的故事，当他即将新婚燕尔，却被列入下岗名单，为了让他高高兴兴地成家，没有人告知他这个消息，直到大海满面春风地去给工友们发喜糖、喜烟，推开车间的大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懂事的大海，为几个留守的师傅点燃了浸着泪水的香烟，然后把所有的喜糖、喜烟

都一股脑儿地抛向了他和工友们为之流过汗水的车间。大海下岗后，每天骑着“倒骑驴”去给人送家具。大海的妻子晓丽爱吃雪糕，她坐在丈夫的“倒骑驴”上，吃着丈夫用艰苦挣来的钱为她买的雪糕，“竟觉得自己有一种冰雪公主般的自豪感”，她全然不理睬身边驰过的一辆辆汽车，因为那些车是靠燃料驱动的，而大海的这辆车却是由情感驱动的，而情感的动力是无限的。

还有向原的故事，为了替厂里分忧，主动要求提前退休，却默默地倒在了为厂里催款讨债的路上。他的妻子沙贞，每天到街头给人擦鞋，并在艰辛中把向原收养的工友的遗孤抚养成人。杨天力的故事，为抢修平炉而不幸殉职，而他的妻子逢素清却对厂里一无所求，只希望找人去拿个小铁块给他带去，因为“有块铁陪着他，他也能静心了”。商国华笔下的工人形象，说是一组群像或群雕并不为过，但他们却像北方的油松一样，密密实实而又普普通通，都是工业深处的普通人。他们讲求的是“钢对钢，铁对铁，心口对热血”，他们的生活中除了诚实的劳动，也有对家庭、亲人、工友的坦诚而无私的关爱。值得提到的是，小说所塑造的普通工人群像，有老有少，包括了几代人，但往往都是与家事民风、儿女私情联系在一起的，如曹文利与逢素艳的故事，赵百儒与魏国兰的故事，曹明与水花的故事，这不仅使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显出了人性深度，而且也具有了东北文学所特有的人情味和抒情气质。

最具抒情气质的是赵百儒与魏国兰之间的情感历程，前者是退休老工人的后代，自己当兵复员后也是普通的车间工人；而后者不仅是师长的千金，而且本身就是前途无限的优秀女工程师。这样的爱情故事，也许是真实存在的，但重要的是两个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献身国企改革理想憧憬，使他们纯真如经典牧歌般的爱情不仅得到了空前的祝福，而且也具有了象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给为小说以写实为基调并稍显沉重的工业叙事增添了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绚丽。

这就是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工人阶级——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献给了生存，却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歌唱，踉跄走路也不忘传递快

乐；他们尽管艰难，也一代代长成了男人女人，到远方当兵或上学，然后又到故乡般的工厂，熟悉了爱恋，懂得了工作；他们一如既往地走在单向街上，在父辈们意气风发的大路上继续斗志昂扬，学会了开心大笑，谈情说爱，饮酒跳舞，然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们习惯了扶着自己走路，习惯了相濡以沫，压力太大就叫喊，饿了困了就睡觉，但从不要忘记维护一个群体的尊严；他们挺身站立在自己的城市，凝视着，努力着，要从混乱、虚伪、误解中寻找一条更好的路；他们的名字叫工人，叫牛段长或大勇或猴腓，但他们并不另类，也非弱势，正是他们，总让一种挥之不去的敬意在国家的血脉中升腾，并让人时时想起工人运动史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那些熟悉的评语。

感动之三：中国大工业的死与生。

美国女作家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令人震撼的是其中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如果要概括一下商国华的这部长篇的思想主题，我觉得就是“中国大工业的死与生”。《我们走在大路上》共有三条叙事主线，一是企业车间，二是工人的家属区，三是郊区和城市边缘，可以说是全景式地展现了特定年代的社会生活，但叙事的核心我认为还是命运感，是对国有企业生死攸关的改革实践和中国工业走向复兴之路的文学勘察。

商国华对工厂和工人的熟悉是令人惊叹的，甚至熟悉到工人日常工作与生活的细节，比如他这样描述北阳重矿新任董事长发表施政演说的场景：“装配车间的几台大小天车停止了运行。车间的过道打扫得异乎寻常的干净，空地上摆满了规格不一的长椅、板凳，车间东侧一个大型的磨煤机齿轮就是会议的主席台，齿轮下近二百米长的车间通道两侧，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作者的情感结构与产业工人及工业社区的情感密码契合无间，这也许影响了某些必要的审美距离，但总体看，小说的情节设置自然而不造作，尤其是场面和细节的真实感，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场面化描写是东北文学的一

个被人称道的艺术特点，商国华对此心领神会，他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记录了一系列或色彩强烈或诗意隽永、充满人生悲喜的历史瞬间。例如王光汉为了推行改革，只能割舍亲情，率先让自己的弟弟光学下岗分流，因为恰好赶上清明节，哥哥和弟弟两家在母亲的坟前相遇，各诉衷肠，通过祭奠母亲的一幕，把哥哥的无奈、嫂子的贤良、弟媳的哀怨、弟弟的通情达理与自我牺牲精神，展现得风生水起，意蕴绵长。

最令人难忘的是工人们对我过去年代生活记忆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留恋，他们对将被出售的水压机、将被淘汰的平炉和将被拆迁的厂房，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历史一定会记下这样的场景，当北阳重矿的百年老厂房面临拆毁的时刻，“人们仿佛在目睹一位圣僧圆寂的大典”，老一代工人们“如同接到了朝拜的指令，突然其刷刷地跪倒了地上，他们用拳头、用手掌一次次拍打着脚下的土地……”是的，他们需要这样的仪式，需要用几杯浊酒和纷扬的眼泪，来感谢这片曾点起共和国的第一把炉火，为他们扛起了那个火红的年代，并收获了一次次梦想与光荣的土地。“感谢老天爷给我们的雨雪冰霜，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也感谢上苍，让我们知道了这天下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我们还要感谢星辰昼夜，让我们记住了创造生活的艰辛。我们还要感谢太阳，一次次为我们驱散了阴霾！”

这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是真正的、可能唯有东北才有的“大厂文学”。这样的场面化描写，其深刻意蕴，几乎能让人想到契诃夫的《樱桃园》，在“新生活开始”了的历史时刻，要人们说出“别了，旧生活”是极其沉重和困难的，也正因其沉重和困难，任何变革都不应该在本质上毁坏我们的精神家园，尽管我们的精神家园是那样的悠久而辽远、丰美而广阔。农业文明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工业文明也同样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本雅明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不是从上帝降临人世，而是由灵魂的不可穷究之处升腾而出；它们是人的最深的自我的一部分。”商国华的这部《我们走在大路上》，让我相信这一论断。文学绝不仅仅是写作过程，这部长篇所传达的正能量之丰厚，

所体现的人性人情之深美，超出了许多貌似工业题材，而实则缺乏切实体验的作品。是什么能为工业题材注入新的活力？我认为就是真体验和大诗意，而对商国华来说，这无不与他的人生经历、文学经验息息相关，是他内在本质力量的展示。那种朴实强劲的思想力量，撞击人心的生命情感，无论是对人性的内在发掘，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度体察，都显得轻重从容，张弛有度。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走在大路上》，可以说，它既是一部老工业基地的创业史、振兴史，也是献给工人阶级的父辈、同时代人以及后来者的工业文明编年史，饱含深情，落花烟重。

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高海涛

—

是时来运转还是临危受命，王光汉自己清楚。

谁能想得到呢！一周前登上去深圳的飞机时，王光汉还是重矿集团的副总呢！可刚登上从广州回北阳的列车，公司的电话就追来了，重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等着他呢！

在一些人的眼里，从副职到正职，不就差半格吗？那可不一样，就一个单位来说，副职可以有若干人，但正职只有一个呀！这就像一副扑克牌，五十四张牌，有许多牌都是相同的，但大王只有一张嘛！从这个意义上说，副职到正职，那可是来了一个三级跳。再说了，哪个当副职的，不想当正职呢！大凡干副职的看到自己正职的任命状，不说天庭立刻放光吧，也是会一阵窃笑啊！

按常理，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人嘛！就是这样。年轻时盼金榜题名，走上仕途了，谁又不想官运亨通呢！当一把手了，一言九鼎，呼风唤雨姑且不论，就说同僚、下属注视你的眼球吧！虚实深浅也大有洞天。那些当下属的，见到你时，他们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幅度，跟你对话中，声音强弱的程度，同在同一条路上，脚步

前后的距离，都是有分寸、有讲究的。何况当了一把手，年薪也要比副职多一大块呀！

王光汉可不这么想，他好像一下子钻进了云里雾里。

不是王光汉怕了，也不是他没有领导这个大企业的底气，谁都知道，北阳重矿公司，那可是堂堂正正的国有大企业，工人总数加起来，一米一个人地齐步走，那可是三十五公里长的队伍。足足可以把他们企业所在的沈西区，围成整整的一大圈呢！

是王光汉怕支不开套吗？说这话，倒是有点靠谱。但话得这么说，不是他能力不行，支不开套，挥不起鞭子，而是手头买鞭子的钱都支付不起了。就说这次市机械局组织的赴深圳参观团吧！去的时候坐的是飞机，这回来的时候，十几家企业，没有一家能买得起飞机票的了。没办法，就是火车票，也是局里花钱买的呢！

王光汉自从接到单位的电话后，心里像长满了荒草一样，他觉得每一棵草都代表着一个车间，每一棵草都在争着抢着要和他的喉咙对话，都想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的难处。

他嫌火车太慢了，他要急着赶回去，见局长一面。他想跟局长说，还有十几天，就到2000年了。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是选一个跨世纪的人来当董事长吧！只要任命状没下来，他认为一切都能有缓的。

王光汉的思路被一阵阵嬉笑声打乱了。他抬起头，朝着正在进行扑克大战的人群望了一眼，这一眼望去，王光汉不由自主地一阵苦笑。只见这次带队的机械局的鲁局长和电缆厂的周总，正在围观人群的催促声中，往一张报纸撕成的纸条上吐着唾沫，并把吐上了唾沫的一个个纸条贴在自己的脸上、脑门上，引来一声声的抚掌大笑。

电器机械厂的刘总数落着电缆厂的周总说：“不让你玩吧，你争着抢着往里挤，咋样？遭罪了吧！知道咋回事了吧！底牌都让人家拿走了。剩下的这堆烂牌，谁接手谁遭罪，这就叫人家偷驴，你拔橛子。还敢玩吗？你可得想好了！”

刘总对周总的奚落、点拨，让王光汉的苦笑收不回来了。王光

汉断了捻的思虑又燃起来了。

此时的王光汉，如同一个独自在路灯下，自拉自唱的操琴者，对近在咫尺的刺耳的叫喊声、嬉戏声、嘲笑声无动于衷，在他的眼里，这节列车上，仿佛只有他一个人，任由火车拉着他往前走。无论是身边谓之动词的，也不管可以用形容词概括的各种声响，他压根就没听到，也没看到。

王光汉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那波光粼粼中划动的船桨，水中悠闲自得中亮掌的鸭群，绿荫掩映下一座座毗邻错落的小楼，特别是铁路线路基旁一簇簇火红的山茶花，都在撩拨着王光汉的眼眸，南方土地上接连不断的景象一一在他的心头复印、生根。

他想起了东北，想起重矿公司，特别又想起了他们临去机场前的那段境遇。

那天上午，王光汉与副总汪俭走出办公楼时，公司办公室主任拦了一辆出租车说：“公司唯一的一台面包车，去火葬场送一位去世的地师级老干部了。你们坐出租车去吧！”

汪俭上车后朝王光汉对视了一下眼球说：“二十几台小车都顶债了，这回讨债的也该静心了。”

王光汉以一声“还有什么可以顶债的？除了人，再顶就该顶设备了”算是对汪俭那句话的回应了。

出租车没走几分钟，就与北二路上要工资的退休工人队伍顶上了。

大路是走不通了，出租车司机听说客人要急着去赶飞机，索性方向盘一转，把出租车开到了人行道上后，又转进了一条胡同小道。

王光汉和汪俭的脑海中，正一遍遍地回放堵在马路上一张张挂满风霜的脸，以及脸上那一条条刻满沧桑的皱纹。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他们的心头回泛着，谁愿意数九寒冬坐在马路上，任由北风推搡，白眼球扫荡呢？

王光汉和汪俭都明白，那些把马路当银行的退休工人，他们知

道厂里真没钱，他们也知道，他们这样做影响了交通，破坏了秩序，如此下策也实在是出于无奈。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掏市长兜里那点儿钱，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想讨个明白，我们是国有企业，怎么就连退休金都发不出来了呢？

一直在反光镜里注视着王光汉和汪俭的出租车司机，正在品味着客人上车后的那句，“再顶就该顶设备”的对话。出租车司机断定，这两位客人一定是从外地来的讨债人。当他看见王光汉与汪俭不住地地望着窗外的神态，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七拐八转的颠簸后，出租车司机憋不住了，“这条街叫北二马路，是北阳市最有名的一条路。说它有名就像人们到了北京，人们可以不知道东四，可以不知道三里屯、和平里，但没有不知道东西长安街一样。说北二路有名，因为它是一条十华里长笔直的大道。路两侧的工厂就像摆在案板上的饺子一样，一个挨一个，而且都是国字号的大工厂。如果说从这些工厂的级别论，上到师地级，下到县团级的，足足有一百二十多家。如果不是工厂门口的大牌子把它们区别开了，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了。”

出租车司机讲起北二路的工厂时，说得唾沫星子乱飞。但在王光汉与汪俭眼里，出租车司机对北二路的理解，纯属是一种小儿科，没有激起他们俩一丁点儿的兴趣。

出租车司机急了，他以为这两个外地人，一定是没听懂他说话的意思，于是他又提高了嗓门说：“这条路两边的大工厂，可都是共和国的功勋厂。功勋知道吧！我也是从苏联、朝鲜电影那里知道的。‘功勋’按中国说法就是功臣吧！这些厂，大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建起来的，每家工厂都有一本创业史和光荣史，共和国许多国字号的新产品，有许多是出自这些工厂。特别是许多号称‘共和国第一的产品’。这么说吧！你随便进到哪家工厂的荣誉室，都会见到那些他们当年创造新产品照片和奖状。”

可能是出租车司机觉得自己说这番话的资历太浅，说到这儿，他又抬出了自己的父亲。“我爸说过，有许多奖状是全国群英会上，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那些领导亲自颁发的呢！前些年，劳模

吃香的时候，北阳市的劳模都是戴着大红花，从北二路走向劳模会场的。对了，你们刚才去讨债的那个叫重矿的工厂，别看现在‘瘪茄子’了，当年，他们厂的劳模到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就有三个人呢！可了不得呀！那时候，谁要是能进这些工厂当工人，那可是着实让人羡慕的一件大事。不说敲锣打鼓吧，起码家里也要包上一顿饺子庆贺一番。用咱东北话说，那才叫‘尿性’呢！可不知怎么了，这几年，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说蔫就蔫了。说句让人痛心的话吧，如今这条路上的工厂，七成都是铁将军和蒿草把门了。过去北阳人把这条街叫共和国工业的装备部，如今呢，有了一个不雅的新名，叫它下岗一条街，也有叫工人度假村的。”

尽管出租车司机把北二路说得有板有眼，以至说到二十几年前时还摇头晃脑的，依然没有引起王光汉和汪俭的话茬。

出租车司机的心冷了，仿佛觉得自己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从反光镜里瞄了一眼王光汉和汪俭后，不紧不慢地挤出一句话：“纯他妈冷血动物！真是不生孩子不知道肚子疼啊！”

列车早已进入了河北省境界。王光汉眼眶中的满眼葱绿、火红，早已被河北平原上皑皑的白雪覆盖了。窗外燕山山脉的长城早已依稀可见。列车一路喘着粗气，朝山海关方向驶去。

王光汉思考的齿轮又转动起来了，这道思考题，让他琢磨很长时间了，而且一旦静下来，就时不时地冒出来，在他的心头萦绕、翻转、撞击。

这个问题，厂里的机关干部问过他，退休的老师傅也想让他说个明白。临行前，那个出租车司机也为这个问题叹过气。是啊！好端端的一个国有大企业，共和国工业史上挂过号的，东北地区也算是一张耀眼的名片了，可为啥说不行就不行了呢？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是冗员？对！这个答案没错。王光汉想起来三十年前，他十八岁进厂当学徒工。那时候，整个工厂算上幼儿园阿姨，也不到三千人啊！这么想对不对？人少就好吗？如果说人少好，1948年建厂

时，全厂工人没超过三百人。人是不多，可那时候的工厂只能小打小闹，生产不出像样的产品啊！真正叫得响了，还是“一五”计划以后啊！如果这么说，该是人越多越好了。“人多力量大、热情高、干劲足”嘛！按照这种推理，王光汉思考的齿轮又转了个三百六十度，重新回到了思考的原点。

人多还是有问题。十几年前的企业接班政策和工厂大集体的膨胀，使企业从一万多人增加到三万多人。

王光汉想起金工车间主任对他说过一件事，金工车间两千人，七成以上的工人都有子女在车间接班当工人，有的一家竟有五个人。如今的车间就像农村一样，亲连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牵耳朵腮动，说话都得小心，整不好，啥时候把人得罪了都不知道。

想到这儿，王光汉越发感到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本来几千人就能摆平生产流程，却增加了两万人，这些人要吃、要喝、要福利，无疑是把生产成本加大了。别的不说，一个月开支得增加多少钱，那还用算吗？问题不是明摆着吗？就是这个理。

王光汉想到这儿，下意识地自己跟自己点了点头。

王光汉点了一支烟，随着飘逸的烟雾，想起了三角债。对，这条怎么能忘呢！企业产品最终要换来货币，没货币，拿啥维持厂里的开支？这么大企业，一天没几百万也开不了门啊！可如今这企业，你欠我，我欠你，产品拉走了，货款回不来，如今甲方都是三孙子，欠债的倒是爷爷了。

他想起了办公室桌上的那张财务报表。这些年，外埠一些企业欠厂里的货款超过三亿还冒高呢！厂里欠外埠的材料款也有二亿多。如果不是这样，干啥这次到深圳学习的火车票让人家局里拿呀！这么大企业，车船票都报销不了，能不让人笑话吗？笑话啥，虱子多了不咬人，这次来参观，如果要各单位负责车船费，我敢说，也没人来呀！都一样，谁也别笑话谁。王光汉一边想一边安慰着自己。

王光汉和琢磨摆上劲了。

王光汉端起茶杯，一口气喝了个底朝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着：“这两条足以说明问题了吧！不行，还有一条。”

王光汉想起了他临上飞机前那些让他听了就心烦的电话。厂办大学要他给学校办照明用电指标，厂办小学要更换暖气片，医院的小锅炉燃煤马上就要断顿了……

王光汉在反问自己，这哪是工厂啊！除了火葬场没有，社会上的五行八作，厂里都干过了。一句话，如今的企业名声叫工厂，其实就是一个大社会嘛！企业办社会的花销，占去了工厂每年一半的利润。这样的企业，神仙来了也没辙啊！说真格的，这几座山一旦要是压在哪家企业身上，谁要是能把气喘匀了，那就怪了！

像一个轻松答完了考题的学生，王光汉稍稍扭动了一下身子，站起身来，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伸了个懒腰后，又重新坐下了。

汪俭从车厢的连接处走过来，把刚刚沏好的一杯茶水递到王光汉面前，“光汉，你这个人的定力真是没得说。这一坐就是一天，你不怕屁股磨出茧子来呀！琢磨啥呢？”说话间，汪俭递给光汉一支香烟。

王光汉喝了一口茶对汪俭说：“瞎琢磨呗！正好，我想问你呢！临到深圳来之前，市里有个通知，说月底市委要召开一个座谈会，让我们汇报目前企业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我琢磨了一下，你看是不是有这么三个原因。”

王光汉把想好的三个问题一个个端给了汪俭。

汪俭沉思了一会儿评价道：“准确，说到家了，哪个企业都跑不出这三条。但我觉得这是浮在面上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根上的问题，才是我们企业目前发展的桎梏。这么说吧，在深圳参观那几天，特别是那天咱们到蛇口工业区走了一遭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王光汉脱口而出，“你是在想袁庚吧？”

汪俭回答：“没错。你想啊，这个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为什么能发发炮弹都打在了弹着点上了呢？依我看，原因有一条，这就是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袁庚自己说了算。这是袁庚最大的自主权。否则，决不会有从一亿元的投资，发展到今天的二百个亿的回